

绪 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外国人，随口都可举出许多中国文化的象征物，大到长城、兵马俑，小到筷子、扇子，不一而足。但是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描述？恐怕就众说纷纭，难得一辞了。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至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定义。

“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汇，其语源是近代学人对拉丁文 *Cultura* 的意译，而借用的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及“文化”等语义，加以融铸再创而成。《易·贲卦·彖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正义》解释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文”、“化”的意思是指以“人文”来“教化”天下。刘向《说苑·指武》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的意义仍是以体现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诗书礼乐教化世人，与武力征服相对应。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化”乃主谓结构，基本属于狭义的文化范畴，大约指文治教化的总和，与天造地设的自然相对称，与无教化的“质朴”和“野蛮”形成对照。

拉丁文 *Cultura* 其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等多重意义，包含着通过人为努力摆脱自然状态的意味。十六、十七世纪，欧洲 *Culture* 一词的含义逐渐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引向精神生产活动，由耕种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培养，并进而被指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似乎与中国古代的“文治教化”相异趣。此后，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被众多学科所探究、阐发。但是文化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也导致了其内涵和外

延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各学科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主观感知与理解的“文化”，按照各自确定的准则，给文化作出界说。因此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文化的定义有二百余个，数量不可谓不多，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定义获得公认。以致西方学者罗威勒认为：“要给文化下定义如同把空气抓在手中一样困难，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无处不在。”我国学者钱钟书感叹说：“你不说，我倒清楚；你越说，我反而越发糊涂。”

文化的定义如此纷繁多歧，令许多学者望而却步。然而作为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定义又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史，也必须对文化有一个大致的界定，不然就会千头万绪，无从谈起。首先，有必要就“文化”与“文明”概念的内涵加以区分。我们认为，文化是内在的、抽象的、概念的，而文明则是外在的、有形象可见的，有客观实际可依据的。我们所指的文化显然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它可以理解为“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的、由各种集体意识所形成的社会精神力量”（金开诚《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3期）。此项界定包含四层意思：首先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属于意识和精神的范畴，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其次文化具有社会性，它不同于人类本能（生理、心理）的精神力量，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依靠后天的教育、学习而获得。文化的社会性还表现在其总体既有一定的社会幅度，又有综合性，它不是指个体的某种精神力量。再次文化是集体意识的产物，而非个人意识。集体意识是相对于容格的“集体的无意识”而言，是后天习得或养成的，具有明显的意识性。最后，文化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文化作为社会精神力量有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它无论表现为一种有约束力的氛围，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或表现为一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都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或使人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或使人自然遵循某种视为当然的惯性，或使人必须遵守种种规范，总之是对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到引导和制约作用。”（见金开诚文）

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它要通过各种文化载体加以实现，以成为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广义文化现实；同时，各种文化载体的研究成果，也会有助于界定观念形态的文化。文化载体，在现实世界中可谓千姿百态，不胜枚举。但是就其形式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类：(1)实物制作表现；(2)规章制度表现；(3)礼仪习俗表现；(4)语言符号表现。当然这其间不乏跨类交叉，比如艺术与审美观念，它既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述论证，也可以体现在物化了的绘画、雕塑、建筑、园林、影视、时装等等作品之中，还可以在礼仪习俗中有其表现。而正是观念形态文化的四类载体及其错综复杂的交叉表现，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现实。

文化史，顾名思义是探讨文化发展的历史，既然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势必造成文化史研究对象的五花八门，这也是文化史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文化史属于广义的历史学范畴，但是在很长时期东西方史学著作中，没有给予文化应有的地位。在西方，迟至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及文化人才开始跻身史著，至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文化史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获得应有的地位。法国启蒙思想大师伏尔泰（1694 - 1778）在此方面立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因而西方学术界称其为“文化史之父”。伏尔泰把历史看作理性与迷信的斗争过程，他反对只记载帝王将相活动的编年体史著，力主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史学研究的范围。他在《风俗论》的序言中宣称，他的著作的目的，“不在于指出某年某个可耻的君主继另一个残暴的执政者之后”而在于指示“主要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他认为数千次战争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利益，而莫里哀、笛卡尔的作品将成为后人永久快乐的源泉。伏尔泰本人的史学实践充分展现了文化史的旨趣，他的力作《路易十四时代》描绘法国路易十四执政时期社会生活的全景，其中包括艺术与民俗，战争与外交，科学与技艺，成为近代文化史的滥觞。伏尔泰之后的两个世纪，西方涌现出大批文化史著作，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史学限于上层政治的狭小格局，把研究视野扩展到物质生产、经济关系、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方

式、思想意识及各种文化现象。在这种把社会、民族及其文化视作历史主体的思想支配下,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今,文化通史、国别文化史、各类文化专史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中国古代历史著作虽然不乏文化现象的记载,如正史中有关的志书,但主要部分仍是帝王将相史。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化史研究是“五四”前后,伴随着中西文化论战而展开的。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如桑戴克(Lyun Thorndike)著、冯雄译的《世界文化史》,日本人高桑驹吉原著、李继煌译述的《中国文化史》等。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学者开始仿效西方学术体例,参酌其史观,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可谓开其先河,他首先提出撰写文化专史,并拟就了《中国文化史目录》,可惜只完成了其中的“社会组织篇”,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材。“五四”以后,文化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专著,以及大量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专题论文,显示了该时期文化及文化史研究的实绩。进入八九十年代,伴随着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亚洲经济的崛起,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成为学术界审视的对象,形成新的研究热潮。但是纵观“五四”中西文化论战和近年的传统文化热,不难发现,文化史研究仍然受到“文化”、“文化史”概念模糊的困扰,或偏重于精英思想史的研究,或偏重于文化载体分门别类的分析描述,将两者完美结合,细述中国文化的源与流的著作,比较少见。我们认为,文化史不是各项专史的简单归并组合,而是在专史研究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提炼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主流及其具体表现。在本书的叙述中,我们力求贯彻前文对狭义文化的界定和关于文化史的理解,抓住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的文化“点”,以点概面,反映中国文化发展的概貌。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尝试,由于学力的限制,我们的概括可能失之偏颇,特别是在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之间,没有找到很好的结合点,仍难以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局限,这是有待于改进的。

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基于不同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多种历史分期方式。我们在本书中,沿用传统的上古、中古、近古三分方式,描述中

国古代文化史。我们认为，三分方式不仅是时间的划分，而且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历史演变观念。具体到文化史来说，三段时期的文化发展，既有前启后继，又各具鲜明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灿烂长河。上古涵盖秦汉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发生和奠基时期。我们的先民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创造出了独立的文明，早期中华文明呈多元发展趋势，尔后历经漫长的兼并融合过程，逐步完成了从部族群落到国家的过渡。夏、商、周三代是文化史上关键性的时期，影响中国历史的许多文物制度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夏、商、周文化发展呈现由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态势。夏、商时期，神巫明显处于文化的中心地位，周文化则相对偏重于世事。周公“制礼作乐”其模式化、规范化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宗法家族制度主要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而也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范本。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 学在四夷”士人获取了独立的身份 在诸侯分治 相对自由竞争的环境下 四方游走 宣扬自己的学说 博取诸侯的青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文化空前繁荣，奠定了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基础地位。在文化多元发生、诸子百家争鸣的同时，文化整合的力量也在孕育，天下一统的心理趋势，不仅是对秩序的渴望，也是强烈的文化认同。秦的统一，在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的基础铸造工程正式完成，中国文化进入了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新时期。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年间为中古。中古时代，中国社会有两个主要的文化现象，其一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长期存在，士族文化得到深入的发展。其二是由于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唐朝开放的对外政策，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行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表现出开放的文化性格。前者使作为文化精英的“士”阶层，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激发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创造力。后者则为文化的进步提供广袤的土壤。这就促使中国文化在精深与宽广两方面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而精深与宽广的融合 造就了文化的高峰 无论哲学、宗教、艺术在这一时期都焕发出异彩。

近古指宋元明清时代，这既是历史学、语言学上的分期，同时也是社会学、哲学上的分期，因为在这些领域，各个朝代都表现出相对一致的特征和明显的承续关系。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近古时代，基于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呈现出繁荣景象。而在专制政治强化的前提下，文化政策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学校和科举已经完全结合，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直接联系起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盛世修典以宣扬文治、粉饰太平、拉拢知识分子，利用文字狱来禁锢思想、钳制舆论，迫害士人。近古社会又是市民社会，这不仅表现在市民社群的形成和市井文化的定型上，更反映在文学适应市井社会的文化要求，从宋词到元曲再到明清小说的脱雅入俗，宗教迎合市民精神需求的民间化、世俗化倾向。在社会文化世俗化的同时，近古时代又不断地出现恢复、重建传统的号召。社会形态方面，倡导重建西周春秋的典型宗法制度；在学术领域，宋明理学以恢弘孔孟以来儒家道统为己任，乾嘉考据学以复兴汉代古文经学为旗帜。虽然不是真正意义的回归与重建，但反映了经过中古开放融合时代的文化繁荣之后，人们对于传统的一种追思和再认识。近古时代，域内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少数民族的汉化，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更是展现出文化转型期丰富多彩的特点。

上 古

——构筑中华文化

第一章 史前文化的多元发生

中国大陆是一块古老的土地,1800 万年前的大陆板块运动,造就了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向东南沿海倾斜的地势,形成了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的不同地貌。南北气候历经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具备了不同的生态景观。中华民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当然,相对于这块土地的沧桑巨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中国文化的兴衰沉浮,只不过是几千年的事。但是,我们要追溯中国文化的起源发生,就必须关注这块土地的地理生态环境,关注人类自起源到有史社会的漫长进化历程。因此中国文化史的开篇,无疑是史前文化。然而,史前文化对我们今天来讲,确实是一个陌生的存在,没有翔实、可靠的文献可以依据,我们只能将考古发掘资料与上古神话传说相互比照、印证,为其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相信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日益丰富,这个轮廓将会越来越清晰。

第一节 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人类的起源,是世界各民族都为之迷惑的问题,创世神话是世界

神话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中华民族的祖先也创造了一个个神话，试图解答这个问题，著名的如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抟土造人传说。当然，这些神话传说只能说反映了我们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具有民间文学资料研究价值，人类起源的奥妙，还需要古人类学、地质学的科学研究来解释。

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已经基本证明，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根据古人类学的研究，“腊玛古猿”是人类的猿形祖先，距今 1400—700 万年。1975 年—1980 年，在云南省禄丰县石灰坝煤场，陆续发掘了一批腊玛古猿化石，距今约 800 万年。腊玛古猿进一步演化为纤细型南方古猿，距今约 400—100 万年。南方古猿是猿到人过渡的晚期代表。1970 年在湖北省建始县高平龙骨洞，发现了三枚下臼齿化石，某些研究者认为与南方古猿纤细型较接近。其他地区也有一些零星发现，但是这一类型还不够明确。

最早跨入人的门槛的是直立人（在中国习惯上称之为“猿人”），大约距今 100—20 万年，相当于旧石器初期。中国是世界上发现直立人及其遗址最多的国家，遍布黄河、长江流域。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是元谋人化石，1965 年 5 月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据测定距今约 170 万年左右^①。元谋人有可能已具备使用火的能力，但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不同看法。

华北的直立人遗址有蓝田人遗址和北京人遗址。蓝田人生活在今天的陕西省蓝田县，1964 年在公王岭发现部分化石，距今约八、九十万年。蓝田人已经能够用锤击法加工石器。北京人晚于蓝田人，但名气很大。1929 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在今天北京市房山县的周口店发现第一具完整的北京人头骨，震动了世界考古学界。北京人生活的时间从距今五、六十万年以前直到 20 万年。北京人的形态比蓝田人进步，身躯的骨骼和现在人差不多。脑容量平均 1059 毫升，而蓝田人只有 780 毫升。北京人掌握锤击、砸击、碰砧等打制石

最近有研究结果，元谋人化石的年代应不早于距今 73 万年，可能为距今 50—60 万年。

料的方法，能够制造复杂、精巧的石器。甚至出现了雕刻器。

长江流域也是直立人生息的地区。安徽和县龙潭洞遗址，湖北郧县的龙骨洞遗址，贵州黔西县观音洞遗址^①，都有直立人化石出土。东北地区的直立人化石遗址有 1974、1975 年发掘的辽宁营口市金牛山旧石器文化遗址，以及辽宁本溪市庙后山遗址^②。

直立人之后是早期智人阶段，距今约 20 万——4 万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中国早期智人遗址十分丰富。华北的早期智人有许家窑人、丁村人、大荔人、新洞人。其中 70 年代末在陕西省大荔县解放村发现的大荔人的时代最早，其形态介于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脑容量 1120 毫升，属于早期智人中的古老类型。大荔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人类研究上的一大空白，其完整的早期智人头骨标本，世界少见。丁村人化石发现于山西汾河流域的襄汾丁村，它所代表的石器文化被命名为丁村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的典型遗存之一。南方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遗址有广东曲江县马坝、贵州桐梓、湖北长阳等。东北地区，近年最重要的发现是 1984 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在辽宁营口市金牛山的发掘。金牛山化石是属于一位刚成年男性的 50 多种骨骼，这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早期智人化石。

晚期智人是古人类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生活在距今大约 4 万—1 万多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期智人石器打制精巧，已经掌握了钻、磨技术，能够人工取火，并能进行雕刻、绘画等艺术活动。中国晚期智人材料十分丰富，遗址遍布全国各地。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石灰岩洞中居住的第三代人——山顶洞人就是晚期智人的代表。山顶洞人脑容量达 1300—1500 毫升，头骨有蒙古人种特征，已懂得装饰，把钻了孔的兽牙、蚌壳、小石珠穿在一起挂于颈项。用骨针缝制衣服。而且埋葬死者，在死者身上洒红色的赤铁矿粉末，目的可能是增添血色而望复生，已有原始的宗教信仰。

中华民族的先民脱离猿类，从树上迁到陆地生活，两手空空，最

目前长江以南地区最大的一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洞穴遗址。

② 这是中国目前旧石器初期文化分布最北的地点。

先可以直接利用的自然物，大概就是石块了。石块加工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精致，代表了原始人类漫长的文明历程。在考古学上，史前社会被称为石器时代，而根据石器加工的粗糙与精致，又具体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我们上述所讲的属旧石器时代也就是中国历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中国古代文献里面，记载了许多原始先民艰难创物的事迹，诸如石器、木器、骨器的加工、火、弓箭的发明等等，虽然只是些神话传说，但是反映了原始的物质文化成就，而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明。中国的古人类遗址，数量众多，材料丰富，几乎每一个人类发展的阶段都有代表，而且具有连续性，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古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多元的文明起源

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是六大文明。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在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惟一延续时间最长的、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曾经存在两个极大的误区，这就是基于欧洲中心论的中国文明外来说，和中国文明单一起源说。但近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当然这并不排斥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外来的影响；另外，中国文明也不是单一起源于黄河流域，而是呈多元发展趋势。

关于“文明”这一名称，学术界有不同的衡量标准，而且往往是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文明肇源于新石器时代，或者保守一点说，是“野蛮”的新石器时代人创造出来的。中国文明有它鲜明的个性，有它特殊的风格。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当然，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还有许多地方仍不清楚，考古学者正在进一步探索。

中国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非常丰富，迄今已发现七千多处，遍及全

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年代大约起于公元前六千余年，一般延续至公元前二千年左右。根据目前正式发掘的一百多处遗址来看，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基本是明确的。黄河流域基本存在着两个新石器文化区，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中内涵最丰富、影响最大的部分。其发展序列，也较其他区域清楚得多，是目前发现遗址最多、研究最充分的区域。黄河中游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70年代后期，磁山(河北武安县)裴李岗(河南新郑县)文化发现，年代大约在公元前6000—5700年，早于先期发现的仰韶文化，是公认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有人称之为“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至今已发现遗址逾千处，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的部分地区，远及甘青交界、河套地区、湖北西北部等地，延续时间为公元前5000—3000年。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是50年代发现的西安半坡遗址。半坡遗址是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全面反映了当时人居住方式、社会生活、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仰韶文化的代表器物是精美的彩陶，彩陶的图案反映了当时人的崇拜意识和审美观念。仰韶文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趋向衰落，继之而起的是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1928年首先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而命名。)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二期文化，就反映出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是早期龙山文化。继承庙底沟二期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的，可能是夏文化。

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趋向衰落，可是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却得到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其彩陶文化。“甘肃仰韶文化”主要包括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传统观点认为甘肃仰韶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的变种，但是近年秦安大地湾文化的考古发掘，有可能要证明甘肃东部地区史前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序列和面貌。大地湾文化既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又有仰韶文化早、中、晚期遗存，延续年代经测定约为距今7800—4900年。其发达的制陶业和规模宏大的殿堂式建筑群落，在新石器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黄河下游文化区，是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地区为主。山东地区

的新石器文化,50年代以前我们只知道有龙山文化,以光亮的黑陶著名。1959年发现的大汶口(泰安市大汶口镇)墓地以另具一种风格的彩陶而著名,大汶口文化较龙山文化早而分布范围大致相同。60至70年代,又发掘滕县北辛庄和平度县东岳石遗址,前者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碳十四年代^①约为公元前5300—4300年,后者则填补了龙山文化至商文化之间的空隙,现称为“岳石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1500年。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其序列,与中原地区和江浙地区各不相同。黄河中下游是有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圈,不过与仰韶文化相对的是大汶口文化,而不是山东龙山文化。

长江流域是与黄河流域同等重要的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新石器文化虽然目前还不能像黄河中下游那样准确地归纳序列,但大致轮廓是清楚的。长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发掘比较零散,很难构成序列,但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的四川盆地,近年考古上的陆续发现,正在揭示该地区作为独立的文明发源地的美好前景。特别是1986年夏,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重大发现,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面具、神树代表着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而这一文明在该地区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相信今后考古上的进一步发现,必将丰富该文明的内容。

长江流出三峡后,进入湖北境内,与最大的支流汉江汇合,冲积成江汉平原。江汉流域与中原地区古代文化联系密切,受到中原文化的较大影响,但仍然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点和发展序列。一般认为这一序列是大溪文化(四川巫山县大溪)——屈家岭文化(湖北京山县屈家岭)——湖北龙山文化,此后进入文明时代。江汉地区的文明形成时间比中原地区稍晚,而且与中原文明影响有关。但是江汉地区古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商晚期在这一带建立的楚国,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长江下游地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迄杭州湾地区,北以南京

^① 利用死亡生物体中碳-14不断衰变原理进行断代的技术,是考古学上应用最广泛的测定年代方法。

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人类很早就开发长江下游地区，距今 7000 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的先民就在这里劳动生息，他们用骨耜种植水稻（遗址发现大量的水稻实物标本）建造干栏式住房，烧制夹炭黑陶器，并且有用象牙和玉雕制的装饰品。差不多同时，另一支文化——马家浜文化（因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而得名）在河姆渡文化的北方发展起来，并很快扩散到太湖的南、北、东三面。马家浜文化的继承者是崧泽文化^①，年代约为公元前 4300—3300 年，据推测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良渚文化是在马家浜、崧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3300—2250 年，广泛分布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从太湖到钱塘江周围一带。良渚文化是 1936 年在浙江余杭县良渚乡首次发现，因而得以命名。考古学界原先一直以为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后的一个变种，但是近年浙江余杭县反山、瑶山，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等遗址的发掘证明，良渚文化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过程，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另一个中心。良渚文化具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已发掘的遗址分布密度大大超过马家浜、崧泽文化时期，反映出人口数量的高度增长，而这必须依赖农业提供大量的粮食；良渚文化原始手工业的考古材料非常丰富，涉及竹编、木器、制陶、丝麻纺织、玉器加工等诸多方面，反映出较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尤其是品种数量众多的玉器，成为良渚文化的重要内涵，近年发现的玉琮、玉璧可谓早期制玉工艺之希珍。良渚文化时期，已有阶级的分化，宗教观念趋向一致，而且很可能有了简单的文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文明因素。

良渚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之一，它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影响和作用，足可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东夷文化相比拟。它的许多文明因素，已经融入了中华文明的长河之中。商、周王朝都吸收继承了这一文化的许多文明因素。比如“玉”在中国古代一直被作为祥瑞之物，商、周二代都把玉器视为至宝，将玉琮、玉璧等作为祭天地鬼神的礼器，所谓“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并无

^① 崧泽遗址位于上海市青浦县城东约 4 公里处，地处太湖地区。

用玉的传统。商、周文化的玉琮、玉璧等在造型、纹饰上，与良渚文化同类器没有多大的差别，显然存在着一种渊源关系。有人发表文章认为，商周之前的夏文化就萌生崛起于中国东南^①。当然，玉琮在商周时代，已远不如良渚文化时的辉煌，因为它沟通天地与权力象征的两大作用被“九鼎”——即青铜礼器所取代了，它上面的兽面纹也多消失了。鉴于良渚文化中发达的玉器文化，有些学者主张在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增加一个玉器时代（或称玉琮时代），这是西方考古学上所没有的类别。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域，是以燕山为中心的长城南北燕辽文化区。该区域红山文化的重要发现，使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红山文化发现于 1935 年，1954 年被正式命名，但考古学界长期以来认为是中原文化^②的派生文化。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红山文化考古获重大发现，已经基本否定了上述说法。1979 年，辽宁喀左县发现石砌建筑遗址，即人们所说的“祭坛”。祭坛出土的遗物，最引人注目的是陶塑人像，共有 20 余件，多属人物肢体，但有两件小型孕妇裸体立像。这些人物塑像是中国新石器遗址中首次发现。该遗址据测定距今约 5000 年。根据遗址建筑技术、布局、塑像推测，显然是当时人从事祭祀活动的一处中心场所。1981 年，考古学者在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积石冢，两年后又在该遗址发现了女神庙。女神庙处在该遗址的中心位置，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多室为主体建筑，单室为附属建筑。整座建筑呈有中心、多单元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殿堂雏形，为研究中国早期祠庙的起源与形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神庙内出土了部分具有很高艺术性的泥塑造像，以人物像为主，其次为动物像。其中，一尊与真人大小相当的头像，极为珍贵。该头像据分析是蒙古人种，是一尊富有生命力而又被神化了的女神头像。积石冢，现已发现六处，位于女神庙遗址的南部和西部。据已发掘的情

陈剩勇《东南文化：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东南文化》1991 年 1 期。
仰韶文化或裴李岗、磁山文化。

况看 积石冢共同的特点是 都以石垒墙 以石筑基 以石封顶 有别于过去发现的单纯的石棺葬。积石冢结构复杂，冢内大小墓有别，且冢与冢相连，与辽东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发现的积石冢迥然不同。冢内排列的石棺墓，既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石棺墓例，也是探讨东北地区石棺墓制起源的线索。积石冢内出土了一批玉器，器型有猪龙形玉饰、勾云形玉饰、箍形玉器、玉环、玉璧等。过去也曾有红山文化的玉器流散海外，但对其时代与文化性质众说纷纭，多倾向认为属于商周玉器，该次大批出土，充分验证了它们属于红山文化的正确性。

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新石器文化。三个遗址分布在 5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属于同一时期，具有极高的价值。如此宏构巨制，如果没有较长的相对稳定、相对繁荣的社会环境，没有超越原始氏族部落的更大社会组合，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山文化的庙、坛、冢不啻是红山文化社会群体的写照，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也可以说，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孕育之中，这时先民们前进的脚步正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关于红山文化的来源 由于 1983—1984 年在赤峰附近发现了距今 7000 年的相当于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时期的兴隆洼遗址，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来源于兴隆洼文化。当然，红山文化也吸收了邻近地区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养分。红山文化分布广，延续时间长达千年 坛、庙、冢所代表的红山文化 是红山文化的最高峰 当属红山文化晚期 其年代距今 5500—5000 年左右。

新石器文化遗址遍布全国各地，我们只是选择有代表性的进行了介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遗址包含了文明的因素，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发现，就具有此种意义。彝族学者刘尧汉先生及其所领导的集体，多年致力于彝族文化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今彝族地区。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我们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它孕育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国家形态，而且长时期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的殿堂式建筑群，辽西红山文化的祭

坛、女神庙、积石冢所包含的殿堂建筑模式与祭天、陵寝等内容均与商周及以后中国古代制度有渊源关系。红山文化的玉器群与商代玉器群题材相同，风格有渊源关系；良渚文化的玉器群与红山文化玉器群属于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文化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商周甲骨文化和青铜文化均以黄河中下游两个文化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主要源头，同时也是其他多种新石器文化内向汇聚熔铸的结晶，表明中国新石器文化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尔后又融合、汇聚于中原，创造了数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国文明史。

第三节 远古神话传说的文化意义

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表明史前时期中国大地上存在过许多创造文化的氏族和部落集团，这不仅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在神话传说、民族学等方面也有许多资料可资佐证。先秦文献中，记载了许多神话传说，虽然过于简单，且经过了记录者的整理和改造，但仍能反映出史前文化的概貌。这些文献中，以《楚辞·天问》与《山海经》记载的神话最为丰富。

《楚辞·天问》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屈原的作品 内容是对天地、人事发出的一些疑问 总共提出了 172 个问题 一说 116 个 统计标准不同)表达了作者对宇宙、人生、历史乃至神话传说的看法。其中有关神话传说部分，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片断的上古神话资料。《山海经》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 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 秦汉时有所增删。全书内容由《山经》、《海经》^① 和《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地理书 对研究先秦乃至上古地理、历史、宗教、民俗、历象、动物、植物、医学、交通等都有重要的价值。《山海经》同时又是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它记载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半神半人物。《山经》把山地划分成 26 个区 记载了 451 座山以及各山的神灵。除了文献记载外，战国秦汉考古发现的一些帛画、画像石、画

^① 分《海外经》、《海内经》。

像砖、壁画，也有许多神话题材，可以增进我们的了解。正是借助于文献和考古的资料，我们得以知道有关女娲、伏羲、黄帝、帝俊、后羿、夸父、嫦娥等上古神话故事，进而推测史前文化概貌。

当然，相对于希腊、罗马神话那样比较完整的系统，中国上古的神话材料还是非常零碎。其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后世特别是战国两汉时期出于政治需要而对神话的历史化改造。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阶层把伏羲、黄帝、尧、舜、禹等传说甚或神话人物改造成为历史人物，构筑了一个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史前混杂的史前社会体系，并认为那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对于原先的神话材料，有利于其构想者则采用，否则弃置，如此就造成了神话材料的人为改造和散失，我们今天自然就觉得零碎和贫乏。以儒家学者为主纂集的史前帝王谱系，在中国学术界统治了两千多年，成为根深蒂固的古史观念，以至言必称唐尧虞舜，尊为盛世明主。本世纪 20 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学者，对这一帝王谱系大胆地提出了怀疑。顾颉刚发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认为完备整齐的古史体系是应战国至两汉政治需要而层层造成的，欺世近两千年，并考订《尚书》“尧典”“禹贡”等篇为战国时代作品。顾氏的观点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立刻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疑古派与信古派展开了激烈论战，论战的文章编成《古史辨》。顾氏一派称“古史辨派”。最后“古史辨派”的观点基本得到了学术界的确认。

神话自然不能当作历史来穿凿附会，但神话的流传及其内涵，实在是文化传统嬗变中其来有自的现象，不会凭空产生。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史前社会“三皇五帝”之类神话传说，虽然屡经臆测改纂，但拨去历史的迷雾，仍不难发现有价值的因素。“三皇五帝”具体名号如何？史前社会有无其人？实际上并不重要。我们可以笼统地说，他们是史前社会华夏、羌、夷、戎、狄、苗、蛮等氏族部落的首领，或者是氏族部落的象征物（图腾），或者是氏族部落的名号。他们所代表的氏族部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断迁移和相互交往的扩大，各个部落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形成相反的利益，而在另一些时候和另一些地方又形成了相同的利益，由此引